苏轼的“西湖”情结

王本道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家、北宋文坛巨擘,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诗、文、词、书、画诸多方面有着卓尔不群的成就,更是思想的智者。尽管仕途多舛,但他却以其丰富的著述和豁达的态度,教人们如何看待荣辱得失。苏轼走过大江南北,巧合的是,他曾几次到过不同地域的“西湖”,似乎与“西湖”有着未了的情缘。在“西湖”,无论是执政还是谪居,他都能一如既往地心怀天下事,想人民之所想,彰显了其博大的家国情怀。

风光秀美的杭州西湖之上,有座近2.8公里长的长堤:苏堤,又称苏公堤,南起南屏山麓,北达栖霞岭下,纵贯西湖南北,堤上有六座石拱桥。从地理位置讲,杭州属钱塘江冲击形成的小平原,当时由于海水倒灌,这里水质不好。唐朝宰相李泌在杭州任刺史时,曾挖掘了六口井分布在城中,将西湖的淡水引进其中供百姓饮用。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来杭任刺史,进一步疏浚了六口井,以解决百姓的饮水问题。但因年代久远,六口井逐渐淤积,以致近于荒废。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三年通判,到任后,便与当时的知州陈襄通过考察民情,制定了修复水井的方案,并请专业人员组织实施,六口井遂焕发生机,杭州百姓又饮到了甘甜的淡水。十几年后的1089年,苏轼又被派往杭州任知州两年。这次到杭州,眼前的西湖已经风光不再,由于春涝秋旱,鱼米之乡两季稻损失惨重。苏轼到任后,一方面疏请朝廷减免税赋,拨米救灾,另一方面组织群众抗灾自救。此间,苏轼做的另一件大事即是疏浚西湖。唐代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曾疏浚过西湖,引湖水灌良田上千顷。但因年深日久,湖水逐渐干涸,葑田已占湖面一半。长此下去,如西湖一旦湮废,沿湖千顷农田就将失去水源。面对这样严重的威胁,苏轼决定对西湖进行全面整治。在得到朝廷款项后,他带领二十万百姓,只几个月时间,便除尽葑草,并将葑草和淤泥堆积起来,填筑成一条南北长堤,将湖一分为二,西为里湖,东为外湖,堤上造六座孔桥通水利,以便舟舫往来。长堤建成后,他又命人在堤上广植柳树,在湖中种植莲藕。从此,西湖不但重放光彩,而且愈加秀美。后人为纪念苏轼,把长堤命名为“苏堤”,“苏堤春晓”则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

颍州西湖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郊。“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雄雌。”这是苏轼对颍州西湖的赞誉。公元1091年9月,苏轼任颍州知州。颍州西湖属平原上的湖,远近均无遮挡,是水患多发之地。苏轼到任后,照例经常深入实地体察民情。为解除洪涝灾害的威胁,他组织群众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并将挖出的淤泥堆成两公里长的堤坝,人们将此堤坝亦称为“苏堤”。

宋绍圣元年,苏轼被贬惠州。苏轼在惠州期间生活的艰难程度要远甚于黄州,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言语不畅,屡次申请的折色(俸禄)得不到批准,经济拮据。身为犯官的苏轼虽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创造条件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很关心惠州的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特别关注兴修水利。惠州原有一湖,谓之丰湖,湖堤早已损坏不堪。苏轼极力倡导民众捐款修堤,并带头捐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钱,还捐出自己官服上的犀带,就连随他前往惠州的爱妾朝云,也捐出了自己身藏的银两。湖堤修成后,当地群众将湖的名字改为“西湖”,称湖堤为“苏堤”。除此之外,苏轼在惠州还为当地群众做了许多事情,包括促农耕兴文教,并写下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最著名的当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早已被当作岭南荔枝著名的广告词。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赞美杭州西湖最有名的诗句。纵观苏轼的一生,曾几次到过不同地域的“西湖”,或许这就是他与“西湖”的缘分。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这样说,无论苏轼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心中的“西湖”,都会留下他或诗或词或文的赞美,都有他踏踏实实为当地百姓办实事的身影。难怪杨万里诗云:“东坡原是西湖长。”清代惠州诗人也有诗云:“北客几人谪南粤,东坡到处有西湖。”东坡对所到之处湖光山水之爱,是一种大爱,因为那里是他的家,是他的国,这种大爱势必惠及当地的黎民百姓。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原本是他一生中最苦难的时期,他却把苦难的日子过得快活如意,有滋有味,过成自己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并一如既往时时以自己的残年余力,为百姓兴利除弊。

我蛰居的小城西郊,也有一处“西湖”,闲暇时曾去游赏过,那是一方恬静淡雅之地。湖面不很大,南北狭长,五六艘游艇同时往来亦绰绰有余。湖边芳草萋萋,绿树成荫,诸多不知名的水鸟往来嬉戏,野趣十足,节假日常有年轻人到此露营。虽然这里属退海之地,历史上与东坡无缘,但窃以为,既称“西湖”,是否也可以增加些东坡元素,如筑起几座石碑,刻上东坡的诗词,或选空旷之地讲解东坡的西湖情结……如此这般,也许会为小城增加几分灵气呢!

孟氏《红与黑》里的『错置』

郝岚

2023年11月3日,孟京辉携《红与黑》剧组在天津大剧院实现首演,算是天津文化界的盛事,从三天的票房看,非常成功。孟京辉多年来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特别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不断拓展和大胆改编,尽管聚讼纷纭,但其拓展和改编本身就是对人类精神产品的一种致敬,值得所有人尊重!经典,不是用来封存膜拜的,它就是在不断被重读、被再创作中,以开放的姿态,持续增长和“生成”的过去的一切总和。孟京辉的价值在于,在看似先锋、荒诞的形式下,他的所有戏剧都是要为人寻找定位,在与过去的经典对话中,追问当代意义。他就是要在这个历史长卷里“签名”,有着对历史大声喊出“我也在这里”的雄心!在这一点上,孟京辉和司汤达是精神相通的。《红与黑》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在此之前从没有一部欧洲小说将目光聚焦在同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之上,当时流行的若不是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就是些奇思妙想的浪漫传奇了。司汤达将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凝聚在个人身上,去描绘“当代的历史肖像”。因此,这部戏在孟氏的戏剧中意义独特。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当代人的价值,他就不需要这么做。这是最古典的“人文主义”,温暖又强烈。

孟京辉的《红与黑》不仅在形式上使用了钢架、影像、沉浸式表演等多样形式,他还有大量的刻意“错置”。戏剧一开始,于连在市长的要求下背诵了一段德语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事实上,尼采出生的时候,司汤达已经去世两年了,这一细节其关键在于孟京辉想要把于连处理成一个个人意志与世界进程之间极度冲突的战斗者,因此剧中于连独白:“人类是一条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条高悬于深渊的绳索。”这个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你必须赞美孟氏戏剧的团队,其剧本的深度和构作者的雄心。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有个深深的“互文”,不是于连会背尼采,而是晚生的尼采在他后来的自传里,对司汤达曾激赏有加:“这个司汤达完全不可估量,以他那心理学家的先见之明,以他那对事实的把握能力,后者能让人想到最伟大的时间的来临——根据爪子认出了拿破仑。”他指的这个“爪子”恰恰是于连,以此可以辨识出拿破仑时代的精神气质,他个人命运的起伏,在小说描述的不足三年里,浓缩了法国那风起云涌的“最伟大的时间”。在一个戏剧的想象的时空里,错置是有价值的,它其实表达了一种观念:有时候,有些人与事不是由当代人定义,而是由后人定义的,比如,尼采重新定义的于连,错置在于连自己的独白里。

其实如果重新思考历史的线性进步主义的局限性,那么每一个时间点都是互相定义的,这正是司汤达被低估的部分:他不只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其实也是浪漫主义的轻骑兵、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拥护者。在他笔下,每一个人都是环境和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在巨大舞台上三层的钢架结构,将小说里暗流涌动的阶层性流动外化出来,于连在小镇市长家里时,从一层想要爬到市长夫人的二层,那些独白、手持横梯前进又后退、爬上一半又左闪右挪的夸张肢体动作,目的不是让观众发笑,而是让我们体味一个木匠的儿子,社会的最底层,想要跃升到上一层的犹疑、艰难和恐惧。而下半场,于连去了巴黎侯爵府,梅婷扮演的市长夫人虽则依旧美丽动人,但是已经处在舞台的左下角,钢架结构的最下层。因为和巴黎的贵族相比,处于外省小镇的市长夫人,虽然富有,但是被巴黎侯爵重新定义之后,在阶层和地理位置上,既是下层的也是边缘的。当环境和条件改变,一切都成了特定产物,他们又定义了历史的特殊时刻,成为历史的画像,这就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所说的“历史观相学”。

戏剧下半部是从一个着现代服装的女歌手上台哼唱开始的,之后也有两位现代女歌手各坐舞台两端弹唱异域风情的歌曲。看似是拼贴的错置,但请注意这正发生在从外省小城到巴黎的场景之中,如果观众细心,上半部小城故事时的后背景一直有一个贝多芬的破碎头像,戏剧用这个方式表达于连不同的生命乐章。在小城里,他孕育着的英雄主义是浪漫的,别忘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本来是以拿破仑命名的,这首曲子的独特在于没有故事性的展开,而是强烈表达了英雄的意志和革命的激情,这都是于连形象的重要核心。来到巴黎以后的于连,处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他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看似良善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戏剧中间题引了马基雅维利的话其意义正在于此。于连虽然在不得已自我“进化”,但仍然难逃厄运,他只能自我分裂最终做出疯狂举动,如同跳脱的现代音乐在一个旧的故事里嵌入。

或许你也会注意到戏剧下半场于连和马蒂尔德小姐交往时出现的打字机以及两个冒着雪花的小小电视屏幕,无疑,不要说它们的量化生产、即使是被发明出来的时间都晚于司汤达这部小说,我认为导演是用打字机一方面形式化了那些鸿雁传书,另一方面呼应了用互相扔书的肢体动作表达的于连与小姐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与“掉书袋”,最终小姐爱上于连正是因为这些智识性交流。于连作为一个下层人的儿子,如此博学,正是拜民主所赐:这是法国启蒙运动以后,依靠那些“生产知识的机器”:印刷机(以及后来的打字机)来实现的。而电视机作为上世纪20年代才发明的媒介,它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不仅比印刷机更为深入,同时象征着由传播媒介带来的不可阻挡的大众化时代的来临。在这出戏里,它一直被摆在远景,暗示着舞台上爱情故事以外,法国大革命以后被释放出来的民众的喧嚣,因此当舞台上一众人马分成两部分,左右对峙谈判,高谈阔论普法战争时,其实就表现了两派政治势力争执不下时,只能让外省来的木匠的儿子做牺牲品。

司汤达年轻时很想做剧作家,可惜他恨大革命以后剧院里都是不解深意的庸俗大众,于是他说,“小说是19世纪的喜剧”,别忘了喜剧关键在讽刺和批判。现在孟京辉把这个小说改为戏剧,他用大量的错置,高度浓缩了500页的小说,并且符号性地暗示了大量背景材料。由于叙述的不完整性,因此看戏是有门槛的:你必须对小说情节熟悉;由于其大量错置带来的冲击,你也必须带着审美的惊奇去玩味其深意。所以,孟氏戏剧看似调侃、热闹,实则有深度、有要求,如果观众无法克服那些刻意设置的障碍,你很可能就成为司汤达讨厌的庸众,孟京辉调侃的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敢于自嘲是当代人的美德。

说说非遗那些事儿(九)

五个层面看非遗

张春生

沽上丛话

第一层面,非遗要有中国风情,民族特色。非遗天生就有民族民间特色,中国人对审美的感觉是很具独特性的,尤其对于自身有着谦虚、内敛、致和的追求,和合共生。这种“和”的元素让我们的艺术有一种稳定、圆润、含蓄的特质。我们要创作具有东方美的东西,一定要保持中国风情、民族民间特色。

第二层面,要传承有序。非遗一定讲究传承。制作人的工艺、演员表演是怎么样的?从哪儿传过来?其手艺传的是什么特点和韵致?要把它弄清楚,弄不清楚,就把握不稳,作品就会走味儿,就弄得哪儿都不是哪儿了。天津三绝:包子、炸糕、麻花。笔者比较推崇的是麻花。为什么?制作者在揉面的这个环节上,宁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要坚持自己原有的特色。无论成品市场需要的数量有多大,在搓条、拧花的工序上,这两处工艺依然坚持手工制作,绝不含糊。当然在流程的某一环节也有大的革新,比如炸制麻花。早先的炸制工序是架一口大锅,有七八个师傅边炸边把炸好的麻花捞出来,师傅虽有经验,但仍会有火候不够或是炸得过火的现象。后来制作者与高校有关实验室合作搞了一个恒温炸制麻花的大型不锈钢装置,而且油温数控自动化,油渣每次按程序过滤,工艺上更洁净,炸出的麻花更香脆。现在的十八街麻花,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手工技艺,它的工业生产线也成了参观项目。传统食品进入现代化生产,展示非遗工艺的手工部分仍然要坚持传统。即使麻花的炸制环节“现代”了,但依旧是按照麻花的传统标准,多大直径的麻花需要如何搓条,需要多大的火候,一丝不苟。非遗的制作生产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该坚持的要坚持。

第三层面,是技艺独具,制作工具独创。比如说面塑,制作过程中从选面揉面、捏制到着色,到最后成型、晾干,是有着固定程序的。木雕也是一样,怎么选材,使用什么木质,怎么借助自然纹理,那是有一套功夫的,不能瞎折腾。还有就是非遗人手中的技术,甚至包括产品的流程一定要按照传统,把独特的东西坚持住。传承人心里要有数,哪几个环节是有特色的,其中也包含制作工具。评审非遗项目的时候,特别是对技术比较突出的传承人,都会要求他们拿出工具给专家组成员看看。

第四层面,是产品一定要有社区的影响,有好的口碑。在相应区域内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绝对不能用“山寨”去傍名牌。历史流变要遵循,技艺传承要尊重。在天津有两个泥人张,研讨的时候就说,这两个泥人张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是家族的,已经传到第6代;还有一个就是泥人张工作室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反映着特殊的国情。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对一些几乎失传的民间工艺、民间艺术,通过政府指导集体协力,推动民间文化恢复活力、推陈出新。那时,泥人张家族传承有困难,需要建立泥人张工作室予以发扬光大。“泥人张”这一从衰到盛的过程,既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也为后来的申遗打下基础。泥人张有两个发展体系,而它的技艺在工作室体系内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不能只强调家族传承,排斥专有的社会传承,或是二者反过来。要承认天津泥人张工作室的历史过程,它也是“泥人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在城镇里,手工业集体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发展,非遗也在其中。只要坚持传统的工艺和流程,是独特的东西,社会都是欢迎的。家族传承,到一定程度由于种种原因收徒了,师徒传承也是传承。非遗项目看的是传承有序,是把产品制作技艺重视起来,让产品不断产生社区影响,产品才有口碑。

最后一层,某些项目亟待抢救,其紧迫性要被认识到。有些非遗项目社会认知度低,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感觉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中国的各种非遗项目从萌生时,就有着“中国心”和“民族风”,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所以,一些濒临衰落的非遗项目,要积极抢救、挖掘、保护,要扶植身怀技艺的年长的传承人和他的团队及其制作、表演流程。收集资料,记录传承口述史,恢复传统工艺,鼓励生产,即使进入市场经营,不同的非遗产品也应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合理竞争,凭本事赚钱。同时非遗项目要与时俱进,在保持传统的同时适度发展。此外,乡间村镇里的表演类非遗,原本发生发展在同一村落、相近街区,尤其演出者的居住地相互之间距离不远,现在乡镇和社区建设变化很大,相聚不容易,非遗活动面临着组织困难,这也极大影响了非遗的传承。需要以文化场站、活动中心等为纽带,让非遗表演进入新的环境生态继续发展。

非遗是一种文化,绝不能因为小制作、小作坊就自我弱化或甘愿被边缘。各行各业各项非遗都有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使社会生活多彩多元,充满活力。过去有大粮行,也有小面铺。老天津的胡同面铺,门脸儿不大,还要适应老百姓吃多少买多少的习惯。蒸一屉棒子面窝头,老板给你称一二两豆面,然后是二三两的细棒子面,再盛十几两的粗棒子面,三种面给你凑二斤,这样蒸出的窝头最好吃,粗细得当还有股子豆香气。买卖这么去做,也是天津特色,是一种地方风情。非遗与其也有相似之处,既有大制作,也有小作坊。非遗和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不能脱离群众。很怕非遗产品嬗变成高高在上的收藏品,待价而沽,远离大众,那也许会使非遗变成“孤家寡人”,乃至束之高阁断了人间烟火气。高端可以有,不要成为孤独的主打。比如说制作年画,还是要多对应春节习俗。年画是一种过节时候的吉祥艺术载体,非把它弄得过分高端,未必是正确的,低高端结合可能更会保有生命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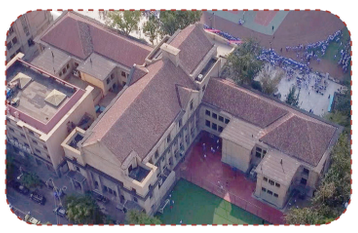
满庭芳

第五二〇〇期

英国公学的“飞机楼”

小楼春秋【62】

魏暑临



在天津“五大道”风景区靠近小白楼一侧,与天津音乐厅仅一路之隔,即湖北路与郑州道交口,原英租界怡丰道与都柏林道的转弯处,坐落着以“立德立功 明达明辨”为校训的天津市第二十中学。该校的校徽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标识该校历史可追溯到1938年,而更为醒目的则是该校教学大楼那形如飞机的俯瞰简略图形。

二十中学之所以将校史溯源到1938年,是因为其前身乃是当年创办的“私立浙江中学”。上世纪50年代初期,该校合并了“私立津华女子中学”,改为公立学校,更名为“天津市第二十中学”。1955年搬入现址,沿袭至今。而在该校搬入之前,那座标志性的“飞机楼”已经保存了比较丰厚的历史记忆。

早在1905年,在安立甘教会学校基础上,英国侨民捐款兴办了天津英租界第一所公立学校,即天津高等小学,这是天津最早的英侨子弟学校。学校的地基由当时的英国工部局赠予。1918年,该校彻底转交英国工部局管理。1926年,该局在原址重建教学大楼,于1928年正式交付使用。从此,这座遐迩闻名的“飞机楼”昂然屹立,见证了近百年风云变幻中的教育历程。该楼由英商永固工程司建筑工程师库克和安德森设计。该司在当时享有盛誉,设计过很多知名建筑,如1886年在原英租界维多利亚路(今解放北路)建造的天津印字馆,上世纪30年代初在南京路建造的天津公学(现耀华中学)等。

该楼整体坐北朝南,主楼全部建筑面积4967平方米,教学大楼总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平面布局对称,俯瞰呈飞机形状,造型十分独特,建筑内外装饰考究,其立面造型既有西洋古典主义风格,又有英国地方传统建筑特点,兼而体现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和军事为其强国主题的新的建筑设计思路。大楼气势恢宏,外檐为红瓦坡顶,混水墙面,开放的主入口为仿希腊神庙式开放前廊,门廊和高耸的屋顶对应,使建筑虚实变化强烈。首层窗户为拱券形,二层以上的窗户为矩形。底部为基座,采用仿青石的斩假石,显得坚实稳重。基座之上外檐是仿花岗石的水刷石大块分格,质感突出。钢筋混凝土檐口,饰以水平线脚。外檐四周两种不同形式的壁柱相间排列。人们站在地面直接面对其正面主体,虽然未必能如俯瞰时领略其独具匠心的飞机形设计,但仍能体会到一种雄浑的建筑气息扑面而来,用作学校建筑,尤其能够体现学校教育严肃博大的气象。

该楼是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局部三层,部分带半地下室。建筑由砖墙和柱子承重,现浇钢筋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小肋空心砖复合楼板,木屋架,多坡筒瓦屋顶,雨水暗排。其各部位各具功能。

主楼共设有5个出入口,在各出入口附近设置了大台阶和不同形式的楼梯,东西“两翼”的门厅分别为女生和男生的出入口,上下楼极为方便。“机尾”左右各设柱式门厅,既是一楼的次要出入口,又通往楼梯间到达二层,作为礼堂的辅助楼梯和安全疏散口。“飞机楼”的“机头”即正中门厅,为主入口,内部设有八根双排塔司干式圆柱支撑上层平台,形成门廊,大厅内两侧采用爱奥尼克式列柱,形成富于变化的空间。

首层房间沿丁字形内长廊设置,腹部有校长室、接待室、工作间、物理和化学实验室、阶梯形讲堂及光学室等。东西“两翼”南向是八间教室,向阳面外檐窗采用深绿色玻璃,室内宽敞明亮,光线柔和。外檐窗底部设小活扇,以利通风。北向是助理校长室、男教师办公室、女教师办公室、医务室、衣帽间以及男、女卫生间等。二层中间为门厅和大厅,大厅内高台阶,水磨石地面,门厅上层的阅览室设有大开间、大型的拱券窗,阅览室正面还装饰有大型柱券、山花。“机身”和“机尾”为大礼堂,设两层看台,600多个座位。前设舞台,后有放映室,舞台两侧设有上下台口,可不经过礼堂到达舞台,设台口楼梯直达三层演员化妆室。舞台上配有钢板制作的安全防火幕,由两台卷扬机带动,这些设施在当时相当先进。

“飞机楼”建成后,英国公学(即英国文法学校)迁入使用,所以,人们习惯将此地称为英国公学旧址,或英国文法学校旧址。该校以服务英国侨民为宗旨,所以只招收外国人子女,极个别情况下招收中国富人子女。在实际教育中,该校以移植纯正英伦风格、培养英国绅士著称,所有基础课程的教授都采用英式英语,据说,其教学水平之高,可与世界名校接轨,该校参加剑桥大学的统一考试,试卷直接从英国寄来,在同一时间,全球所有的英国文法学校同时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

从该校杰出校友的成就,可窥见其当年教育成效之一斑。例如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作家,是为数不多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之一。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于1920年开始居住在天津。当时的天津有大量犹太人居住,主要集中在“五大道”和小白楼地区。爱泼斯坦曾在英国公学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自幼就有当记者的梦想,在该校就读期间,曾在纽约《前进报》的“儿童专栏”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

此外,美国著名作家约翰·赫塞、英国著名画家默文·皮克、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啸云等也是英国公学优秀校友。齐啸云是我国用英语演唱京剧的第一人,她曾用英语演唱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的原创京剧《奥赛罗》以及中国传统名剧《赤桑镇》《铡美案》《除三害》等,并将希腊名剧《巴凯》翻译、改编成京剧。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国公学的办学面临巨大挑战。1941年,驻扎在天津的日本军队开始驱逐和逮捕租界内的英美籍侨民,强行进驻英国公学,驱赶师生,将其改为日本宫津女子学校。抗战胜利后,英国政府试图复建学校未果,其后,校址被改为天津训练团。天津解放后,天津市民政局曾使用该建筑,直到二十中学正式入驻。

如今,在承载着百年天津沧桑文化的和平区繁华地段,作为市级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的“飞机楼”,正在二十中学师生的琅琅书声中,以全新的教育面貌开启不断腾飞的教育航程。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小楼春秋》解说词:

走上通往二楼阅览室的走廊,高高的拱顶、幽深的楼梯,仿佛进入了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外国孩子,从五六岁入幼稚园一直读到中学毕业,之后参加统一考试,试卷从英国寄来,全世界所有的英国文法学校,同一天同一时间开考,考试通过就可以升入剑桥大学深造。(节选)